第一章元代庙学的结构和祭祀

第一节元代庙学的结构

元代庙学的结构基本上沿袭宋代，并更加定型。庙学四周筑有围墙，墙顶插上鍪石，以防外人随便爬入。墙中开有几道门，作为进出庙学的通道。庙学的正门为棂星门（其在庙学中所处的位置很似天座中的灵王星，故名），相当于王宫的路门。穿过棂星门，便可看见一个上面架设了小桥的水池，此即泮池，或称泮水（中国上古诸侯之学称为颁宫，因颁、泮同音，有人误将泮作颁，后世相沿成习，故名）。泮水一般都设于棂星门之内，如有例外，像新昌县学原设于棂星门之外，大德初也都按常规改创[①]。跨过泮池，穿过仪门（或称戟门），进入庙学的主体部分

①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七《新昌县学改创泮水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9年初版，版本下略）第 10册，第 7289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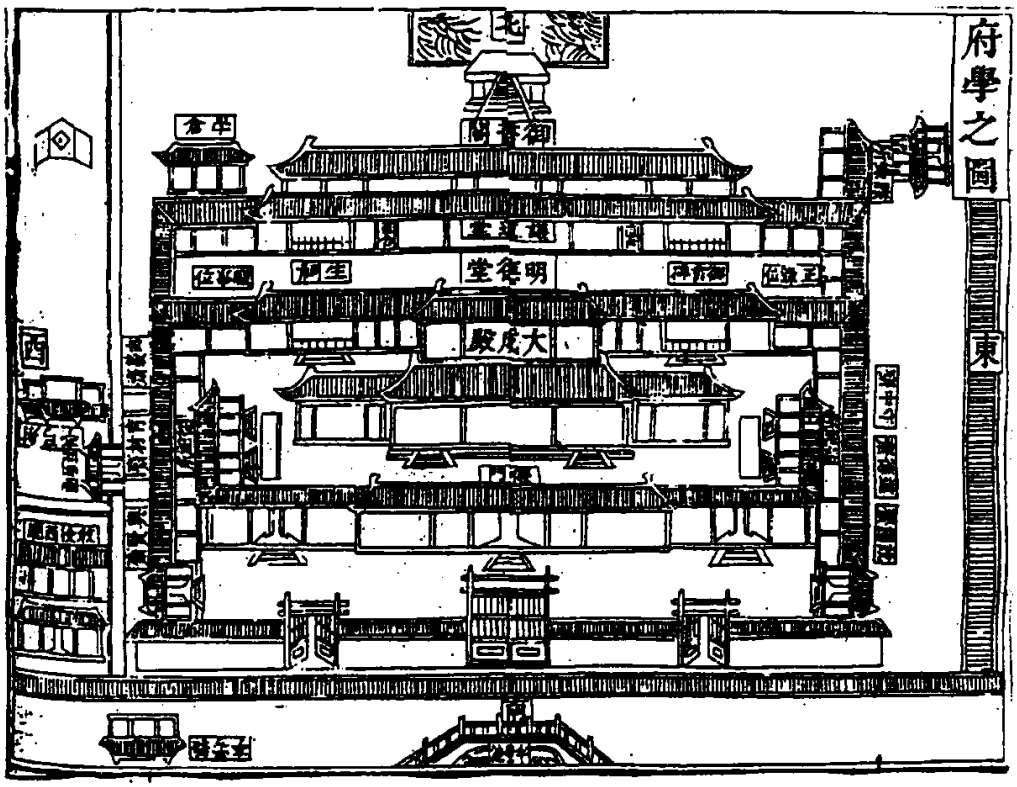


图 1—1　宋代建康府学图

—— 孔子庙和学宫。

孔庙和学宫的位置一般为孔庙在前，学宫在后，即所谓前庙后学；或孔庙在左，学宫在右，即左庙右学，以示尊崇。座向一般为座北朝南，宋代还有少数东向的庙学①，到元代则很难见到。

孔庙的大门为大成门，主体由大成殿和先贤祠组成，是庙学

①如兴国军学和吉州州学就一度东向。参见王质《雪山集》卷六，《兴国军学记》，收在《四库全书》第 1149 册，第 397页；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十八《吉州改修学记》，收在《四库全书》第 1147册，第 308页。

祭祀的主要场所。大成之名，最早是宋徽宗御书大成殿名于国子监，后天下学校纷纷效仿。大成殿正中供奉孔子塑像（面南），孔子像的两边为两公（或四公，元末才统一为四公），十哲塑像分东西向排列，东西各五位，其他七十子及先儒画像绘于墙上（因画像容易脱落，元末也有个别地方画像改塑像者）[①]。元大德十一年七月之前，孔子谥号至圣文宣王，之后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入明后，这一称号仍沿袭到明中后期，直至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辛丑更正孔庙祀典，定孔子谥号曰至圣先师孔子。孔庙孔子、四公、十哲采用塑像的惯例亦延用到明嘉靖年间。明洪武十四年四月，南京兴建新太学，明太祖下诏以孔子木主易塑像，此乃个别情况[②]。嘉靖九年，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建议，下令孔庙塑像改用木主[③]。

元代祭祀四公、十哲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大致说来，南方承袭南宋的配享和从祀制度，北方则用辽金之制较多，元统一后这种局面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唐开元间孔庙配食颜子，拔曾子于诸子以足十哲。北宋神宗熙宁七年，诏封孟轲邹国公，孟子与颜子并配，此即两公。因有学者认为由于子思学曾子，孟子学子思才使得儒家道统得以沿袭，故南宋度宗咸淳三年，诏封曾参郕国公，孔伋沂国公，与颜子、孟子配享先圣，至此有四公之

① 昆山州学至正十年改壁画为塑像即是一例。见朱珪《名迹录》卷一《昆山重修儒学记》，收在《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初版，版本下略）第 1册，第 26页。

② 详情参见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号),第 70 册，part 2，第 514 页。

③《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1 版，版本下同）卷四十七《吉礼》一，第 1231页。

说；封颛孙师陈国公，升十哲位。十哲为：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东面，西向北上），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居殿上西面，东向北上），为从祀。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在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被列为从祀；理宗景定二年张栻、吕祖谦从祀；度宗咸淳三年，复以邵雍、司马光列从祀（两人在端平二年就得以入祀)①。金的辖地一部分原为辽朝管理，一部分为原北宋疆土。辽朝孔庙祭祀沿袭唐代，金朝则用北宋之制，而当南宋度宗咸淳三年祭祀四公的时候，金朝已经灭亡。故元朝统一之初，北方主要采用北宋之制，孔庙以颜孟配享，少数落后地区仍采唐制，仅配以颜子②。江南因原为南宋管辖，故采用南宋之制，孔庙配以颜（子）孟（子）曾（子）（子）思四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两种祭祀制度长期共存，并相互影响。“宋平，北方学者安颜孟而异曾思，闽宪首请黜之，当国之臣不然之也。其后一侯为宪河南，是时襄阳未入山南，犹其所莅也，不请而遂黜之，由是庙配止颜孟。”③ 北方祭祀二公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仁宗延祐三年，在延祐元年圣旨免除亚圣后代差税的诏令中也都只提到颜孟而无曾思④。祭祀的这种南北差异引起诸多不便，一些儒士如姚燧竭力呼吁曾思对儒家道统的延续功不可

①《宋史》（中华书局 1977年 11月第 1版，版本下同）卷一五〇《礼志·文宣王庙》，第 2547－2555页。

②郭嵩焘《畿辅通志》卷一四五《迁修文庙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11册，第 8246页。

③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卷十三《襄阳路重修庙学碑铭并序》，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6册，第 12192页。

④蔡美彪《元代白话碑》第 68《1314年曲阜文庙免差役赋税碑》，第 7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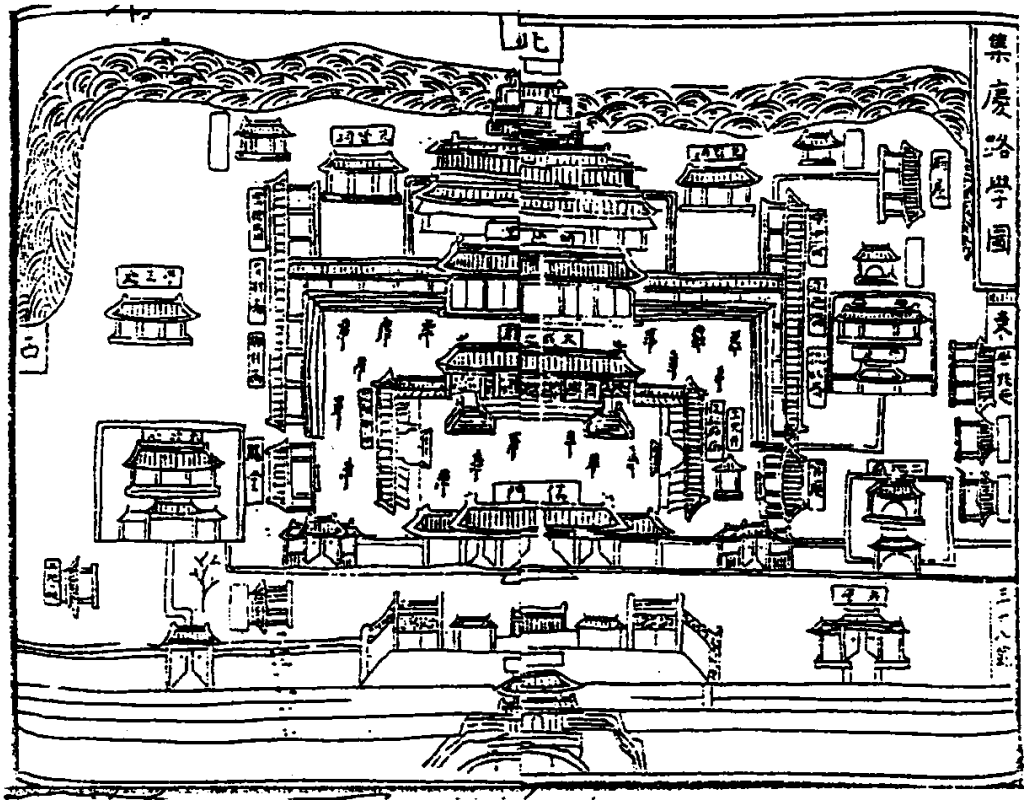


图 1—2　元代集庆路学图（从中可比较宋元庙学结构的差异）

没，黜之不义，理当配享①，于是在延祐三年七月，诏春秋释奠于先圣，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②。这一诏令其实是南宋度宗咸淳三年诏令的重复，反映了元朝尽管在政治上统一了全国，但孔庙从祀制度直到元中期还保留南北分治时的状态。且这一诏令执行得非常缓慢。如陕州庙学到至顺三年才重修孔庙，增

① 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卷十三《襄阳路重修庙学碑铭并序》，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6册，第12192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4月第1版，版本下同）卷七十六《宣圣》，第1892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祭曾思[①]；定县庙学元统二年增创郕沂二国公配位（文宗至顺元年加封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故名）[②]；藁城县宣圣庙至正八年补两配飨于殿[③]；彰德路学在至正元年监察御史到来之后“增像二公，合为四配”[④]；完州州学“旧像止颜孟，累政因仍，义不遑及”，至正十二年才得以增创[⑤]。至正年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佥事杨俊民就说：“迄今（指至正八年）尚有未升曾思，大郡且然，况小邑乎？斯文之难也。”[⑥] 郡县奉行未如条格的情况可见一番。北方庙学祭祀四公的过程，直到元末才真正完成。那种认为延祐三年仁宗配享四公的诏令标志全国文庙制度统一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⑦]。

明代孔庙沿袭对四公的祭祀。洪武五年，明太祖巡视国子监，因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名言有损自己的威严，下令罢孟子配享。逾年，即又恢复。皇庆二年六月，仁宗以许衡从祀，又以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

①韩嘉会《陕县志》卷二十一《元陕州重修庙学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9册，第522页。

②贾思绂《定县志》卷二十《增修庙学记略》，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4册，第306页。

③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十三《藁城县宣圣庙绘塑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8册，第13584页。

④李国禔《安阳县志》卷十一《彰德路重修孔子庙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8册，第531页。

⑤王树楠《完县新志》卷九《建儒学记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3册，第694页。

⑥ 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十三《藁城县宣圣庙绘塑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18册，第13584页。

⑦ 周良宵即持这种观点，见其所著《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712页。

栻、吕祖谦从祀。除许衡外，其他几位在南宋时就已列入从祀，显然是因为北方采用北宋之制，南北不同，至此颁布诏令，以求统一。其真正贯彻当同四配一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如藁城县孔庙“两庑七十子旧图于壁”，至正八年才“绘七十子暨十儒于两庑”[①]，但它的最终确立对此后明清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影响深远。进入从祀的七十子姓名十分冗长，不便一一排列。即使在元代，时人都觉得颇难记住。故金华人张孟兼稽考异同，集为章句，以便记诵，结果广为流传[②]。

对孔子的崇奉不能不惠及其父叔梁纥。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叔梁纥为齐国公；元文宗至顺元年，加封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明嘉靖九年，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建言，下令在孔庙大成殿之后，别立室祀叔梁纥，而以颜子、曾子、子思的父亲颜路、曾晰、孔鲤配享[③]。故从此开始，孔庙除大成殿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部分，即启圣祠（见图 1—3）。

先贤祠，又名乡贤祠，供奉者或为对庙学有功的先正达官。如惠安县学乡贤祠祭祀前后主持庙学修建的几位官吏：监县乐礼公、县尹吴汉臣以及陆君华[④]。不过，祭乡贤的主要目的是表彰忠孝、净化风俗、提倡纲常。故彭泽县庙学三贤祠祭祀高风亮节、

①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十三《藁城县宣圣庙绘塑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8册，第 13584 页。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二《孔门弟子》，见“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丛书”《元代笔记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第 437页。

③ 《明史》卷五十《礼志》四，第 1298 页。

④卢琦《圭峰集》卷下《惠安县学修学增田记》，见《四库全书》第 1214册，第 7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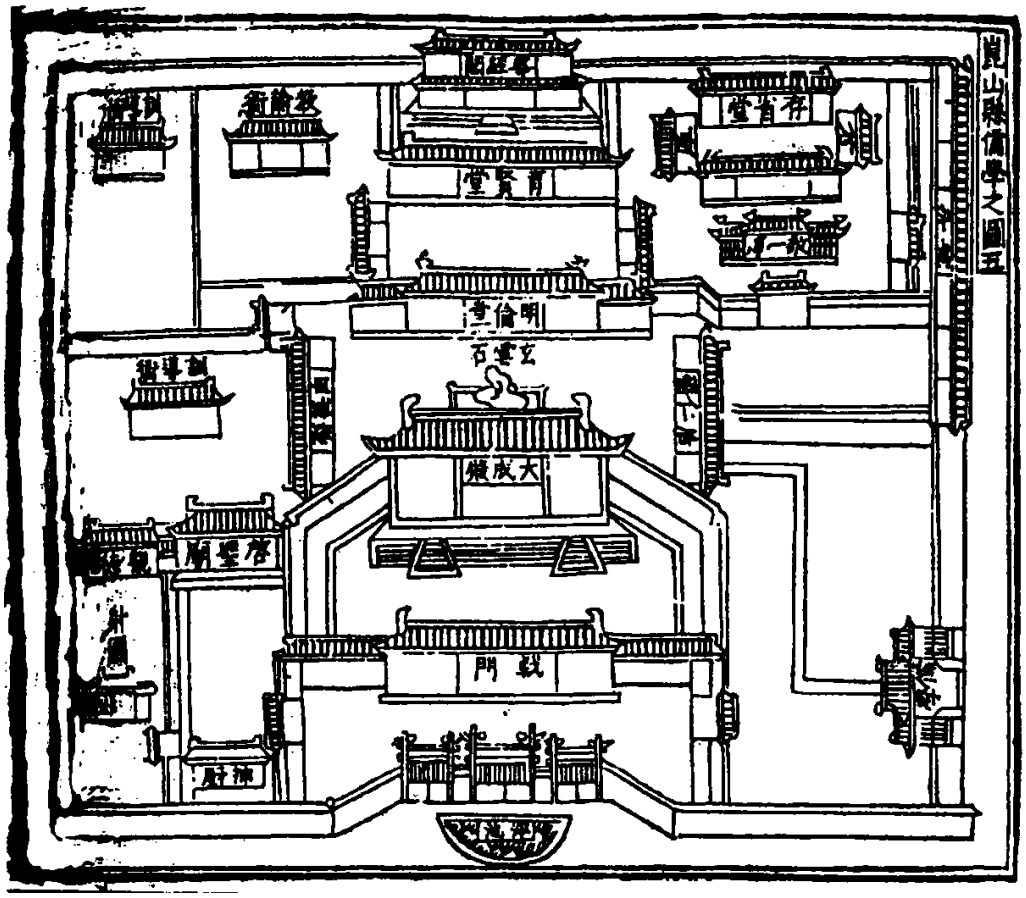


图 1—3　明代昆山县儒学图（敬一亭与启圣庙为明代出现）

楷模千古的陶渊明、唐狄梁公仁杰和苏东坡①；句容县学乡贤祠供奉居丧尽孝、守墓 36 年的张常洧和孝忠皇帝、死于黄巢义军之手的刘邺②。祭乡贤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人们见贤思齐，油然联

①刘将孙《养吾斋集》卷十六《彭泽县学三贤祠记》，见《四库全书》第 119 册，第 143 页。

②　《句容金石记》卷六《乡贤祠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650 页。

想起亲亲尊尊的儒家道德，从中受到教育。故有些地方起初因稍有功劳而被供奉的乡贤，后亦为孝子取代[①]。

先贤祠与大成殿不仅分开而建，两处的祭祀规格亦不同：孔子、四公、十哲、七十子及先儒是天下庙学通祀，享受更高的祭祀规格；乡贤只是在地方庙学祭祀而已。前者为天下共同尊奉，后者则与当地接近，更为诸生熟识。但两者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除上古孔子及其弟子理所当然地进入从祀之列外，近世的学者要想进入首先必须取得乡贤的角色，具有乡贤的基础。从宋代九儒死后到其被列入从祀的时期内，在其原来讲学之所，或仕任之地，或过往之途，或影响所及，都已被当地乡贤祠供奉。例如，嘉定间南安军学乡贤祠供奉周敦颐、程颐、程颢，是因为“昔周子二程相与讲习其地”[②]；永州州学建周先生祠乃因周敦颐嘉祐中曾担任永州通判[③]；因“周子尝仕合阳”、二程先生曾“游于广汉”,故开禧三年成都府学建三先生(周敦颐、程颐、程颢）祠堂[④]。鄞县学修建乾淳四先生祠乃是出于近代师表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的理论影响所致[⑤]。在皇帝下诏孔庙从祀九儒之前，九儒已普遍荣登南方各地庙学乡贤之位。开禧间三先

①《两浙金石志》卷十八《元浦阳五贤赞》，见《石刻史料丛书》甲编（台湾艺文印书馆 1967 年出版，版本下略） no. 18，第 14册，第 1—2 页。

② 叶适《水心集》卷十一《南安军三先生祠堂记》，见《四库全书》第 1164 册，第 226 页。

③ 张栻《南轩集》卷十《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见《四库全书》第 1167 册，第 511 页。

④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八《成都府学三先生祠》，见《四库全书》第 1172 册，第 436页。

⑤袁甫《蒙斋集》卷十四《鄞县学乾淳四先生祠记》，见《四库全书》第 1175 册，第 501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周敦颐、程颐、程颢）之祠就已“遍天下”[①]。宋末皇帝下诏从祀近代九儒其实是对其影响广大这一现实的承认，当然也更加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元仁宗重申此诏旨则加速了程朱理学对北方社会的渗透。元仁宗同时下诏从祀许衡，而在此之前大名已经修建了许衡庙[②]。除建立鲁斋书院专门祭祀许衡，许衡生前执教过的关陇地区纷纷建学以祀。乡贤祠与孔子、四公（二公）、十哲、七十子及先儒一起构成等级的阶梯。宋代九儒和许衡均为近世之人，他们可以由凡人到先贤，再入从祀；颛孙师可以由从祀先贤步入十哲之列；曾子、子思可以从十哲跻身四公。这些无疑不在启发人们：只要你们好好修身，死后同样可以成为贤儒，在世同样可以得到晋升，社会已经为每一个人架设好等级的阶梯，你们同样可以做到公侯伯爵，但孔子是不可动摇的，是无法逾越的，他是万世之师，是大成至圣。这个孔子其实早已死去，对他无论多高的封号对一个作古之人来说已无多大意义，但他实际上是皇帝的化身，树立孔子至高无尚的地位实则是在标榜皇帝的权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庙对亡灵的祭祀其实是在演绎现实社会的准则，从祀者的位次不仅关乎故人的后代，更是社会礼仪所在，千万不可儿戏。明白了此理，就不难理解为何当政者那么强调祭祀的重要。

明代继承并发展了元代庙学祭乡贤的传统。明代庙学不仅建有乡贤祠，还增加了名宦祠。洪武二年，明太祖下诏文庙附祭乡

①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十八《成都府学三先生祠》，见《四库全书》第1172册，第436页。

②《元史》卷七十六《祭祀》五，第1904页。

贤名宦，即出身当地的有名官员[①]。于是，从明初开始很多庙学都建起了名宦祠。

除大成殿外，孔庙部分还有储藏舆服、祭器之地，或称祭库，或称三礼堂[②]。有的庙学有单独的乐器库，有些孔庙还建有土地庙[③]。

学宫的主体部分是明伦堂和尊经阁。明伦堂又曰明德堂、崇化堂，为诸生习业之所。讲习的要旨是为人之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故明伦堂的斋室均冠以与人伦有关的儒雅之名。明伦堂由几个斋室组成，斋室数目一般成偶数，即或二、或四、或六、或八[④]。镇江路学明伦堂就有所谓志道、据德、居仁、正义、存心、养性、敬老、正蒙八斋[⑤]。

尊经阁名称颇多，或曰文昌阁、观海阁、九经阁、斯文楼，或曰稽古阁、经史阁、御书阁，为庙学藏书之所。图书的来源不外乎三种。或捐赠。宋代有所谓御书、赐书。宋神宗和宋徽宗喜好舞文弄墨，四明庙学就藏有他们所手抄的一些儒家经典；淳熙七年，宋孝宗有旨将皇子魏王判官藏书 4912 册 15 轴赐与四明庙学[⑥]。皇帝赠书在元朝少见，一般私人赠书则见于记载。如至正

①杨芳灿《四川通志》卷七十六《学校》一，见《中国省志汇编》（台湾华文书局印行）第 7 册，第 2503 页。

② 福州庙学称此部分为三礼堂，见福建通志局纂《福建通志》卷七《福州庙学记》，收在《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15 册，第 11144 页。

③如集庆路学即建有土地庙，见张铉撰《至正金陵新志》（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83 年影印)卷一《集庆路学图》，收在《中国方志丛书》，第 1573 页。

④《元代庙学和书院的规模》，〔日本〕牧野修二著，《爱媛大学文学部论集》（文学部）12，第 34 页。

⑤《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学校·儒学》，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2764 上页。

⑥ 《宝庆四明志》卷二《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5013－5014 页。

年间庆元路照磨吴子辉的父亲将四部家塾《汉文忠经》一册、《古文孝经》一册、《忠烈事实》一册、《孝义事实》一册捐献庙学①；栾城县学得到佥枢公所赠图书一万卷②；彰德总管胡某主持募捐图书一万二千卷，并将书籍总目和捐书人姓名刻之于石，免除抄录、假借的麻烦，方便学者③。或购买。杭州是南宋都城，也是当时的出版中心，不少庙学从京师（即杭州）、从国子监购书，金代地方庙学教材都买自国子监④，元代沿袭了这一传统。如淮安路儒学“市书于杭得三千卷’⑤。南宋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出版亦很发达，时人朱熹就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⑥ 或自己根据书板刊印。在元代，刊印发行图书要得到主管的监察部门批准。如庆元路学所藏《困学纪闻》系泰定二年廉访佥事孙楫命刊；《玉海》等书先是浙东都事牟应复建议板行，至元五年宣慰使都元帅也乞里不花资德命刊⑦。从元世祖开始，在集贤院下设有兴文署，专门负责全国书板印行，此乃元朝的一大创举。兴文署，秩从六品，置署令一员，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员，以翰林应奉兼之。至治二年罢，置典簿一员，从

① 《至正四明续志》卷七《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6537页。

②《常山贞石志》卷十八《栾城县学田记》，见《石刻史料丛书》甲编， no. 16，第 9册，第 1页。

③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十一《府学储书记》，见《四库全书》第 1196 册，第 215页。

④《奉天通志》卷一百四十九《教育》，第 3460页。

⑤《江苏金石志》卷十九《孔庙经籍祭器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3册，第 9927 页 。

⑥ 朱熹《晦庵集》卷七十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见《四库全书》第 1145册，第 627 页。

⑦ 《至正四明续志》卷七《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6535 页。

七品，掌提调诸生饮膳，与凡文牍簿书之事。仍置典吏一人①。

元代的书价不得而知，不过书板的价格大致可以推算。宋宝祐间赵节斋发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严陵刻本，“字小且讹，精加雠校，易为大字刊本，藏之。”后来曾有人出中统钞三百锭向赵节斋的孙子赵明安求市。说明该书板的市面价在中统钞三百锭左右，书板共计 84508 面，时间是在延祐六年②。

庙学图书一般分书板和书籍。书籍数量因路、府、州、县各级学校而异，但此划分不能绝对。同一级的学校藏书量也会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大致说来，南方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动荡很少，庙学藏书较丰，一些学校尊经阁藏有“宝镇”，如鄂州州学稽古阁收藏有绍兴石经及两朝宸翰，价值颇高③。庙学藏书多则几百种、上万卷，少则几十种。图书种类一般为：四书五经的多种选本、注本；迄唐为止的几部正史、宋以前（含宋）的几部主要类史、史评及当地方志；先秦诸子的经典；多数集中在唐宋的文集、诗集。这些书籍多为科举必考内容。《至正四明续志》保存了至正年间庆元路学的藏书目录，其藏书量在元代既不算颇丰，亦不为甚少，约为中等水平，从中可以窥见一般庙学的藏书种类。详见下表。

① 《元史》卷八十七《百官》三，第 2193 页。

② 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元嘉兴路重修庙学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4 册，第 10565 页。

③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鄂州州学稽古阁记》，见《四库全书》第 1145 册，第 658 页。

表 1—1　至正年间庆元路学藏书目录一览①

分类	书名
经	《四书集成》、《春秋左传》、《诗缉》、《公羊穀梁传》、《大学纂疏》、《四书精要》、《论语集注》、《东莱读书记》
史	《通鉴纲目》、《通鉴目录》、《通鉴精义》、《九朝通鉴》、《纪事本末》（编年）、《通鉴》、《续通鉴》、《北齐书》、《南齐书》、《南唐书》、《宋书》、《梁书》、《陈书》、《周书》、《魏书》、《旧唐书》、《晋书》、《南史》、《北史》、《五代史》、《读史管见》、《通鉴编年》、《细字通鉴》
子	《张子西铭》、《老子道德经》、《周子通书》、《庄子南华经》、《周子太极图》、《大学衍义》、《朱子语略》、《西山读书记》
集	《集元次山集》、《濂西大全集》、《山谷集》、《二苏应诏集》、《王文公集》、《剑南续稿》、《白氏长庆集》、《渭南文集》、《紫阳文集》、《东坡大全集》、《杜诗》、《丽泽诗集》、《东坡诗注》、《后山诗注》
其他	《职官分纪》、《三朝言行录》、《四朝言行录》、《锦绣万花谷》、《五朝言行录》、《续四朝言行录》、《姓氏辨证》、《经济奏议》、《艺文类聚》、《白孔六帖》、《事类合璧》、《续四明志》、《汉文忠经》、《古文孝经》、《忠烈事实》、《孝义事件》

总体上讲，庙学的实用类图书极少，像庆元路学的多种书板中，仅《月令解》较为帖近生活，教人一些气候常识。四明地区另有一部《耕织图》书板，但都是杜洲书院收藏②;元末诸城县

① 资料摘自《至正四明志》卷七《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6535—6537 页。

② 《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6556 页。

学藏有《狄梁公碑字》一帖、《书谱碑字》一帖，属书法类①。庙学图书更多的是示人以忠孝礼义，此乃庙学的宗旨所在。元代庙学图书管理不善，书籍散轶、书板蠹朽的情况严重。入元后，镇江庙学书籍所存者不及什之二三②，“书板旧刊甚富，闭置暗室，岁久朽蠹，无复修补。今所存止二十八种五千四百四十七板，惟《堂阴比事》则教授朱天珍所增也。”③保存至今的《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记载了三个不同时期四明庙学（宋称明州州学，元称庆元路学）较为完整的图书目录及册数，对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图书种类呈递减的趋势。宝庆年间收藏的价值珍贵的赐书、御书到元延祐年间已经不翼而飞；延祐年间一共有图书 82 种，其中 62 种到至正年间仍然保留，但减少了 90 册，而另外 20 种书 279 册不知去向，新增的仅九种 88 册，其中四种是私人捐赠，故纯从数量上看，延祐到至正年间图书减少 11 种、281 册。可见几十年间四明庙学非但未购置新书，旧有数量也无法维持，庙学的贫困和管理的混乱不难想象。

学宫部分还有供庙学师生休息、就餐、淋浴用的斋、厩、庖等，即庙学的生活区。有个别庙学教授起初住在远离庙学十里之地，对师生切磋学艺带来诸多不便，故改在学宫旁边营造教授厅④。一些庙学前后植有松桧竹柏，环境十分幽静⑤。

①朱学海《诸城县志》卷十五《密州重修庙学碑》，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 28 册，第 60 页。

②《至顺镇江志》卷十一《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2765 页。

③ 同上书，第 2766 页。

④张仲炘《湖北金石志》卷十一，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6 册，第 12163 页。

⑤ 《两浙金石志》卷十五《元嘉兴路重修庙学碑》，见《石刻史料丛书》甲编，第 11 册，第 33 页上。

元代庙学与前后朝相比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射圃的完全荒废，改作它用。在正统的儒家看来，射是六礼之一，排在礼乐之后，对于培养士人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同时，射又属武事范畴，经常习射有助于提高人的作战能力，故射圃与武举息息相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三舍法，武学附选，各地庙学纷纷建圃习射。射圃位于学宫周围，射圃中树立箭靶，边上建有观德亭，“诸生暇日相与揖逊，习威仪而观德行”①。后来三舍法罢，武学废，射圃亦废。淳熙元年，南宋孝宗皇帝颁射义于天下，企图重振射圃，地方仅有少数庙学响应。如淳熙三年冬四明州州判皇子魏王“度地筑圃于学宫之前，凡六亩四十一步三分有三厘五毫有奇”②；绍兴府上虞县淳熙十二年守臣刘筥到来之后才“垦东偏废地，芟剃草莽，辟为射圃。”③ 广州州学射圃是在淳熙元年州县学立射圃诏下达后的第五十年才得以创建④。其后只有极个别地方对沦弃榛莽的射圃加以剃葺⑤，射圃的长期、普遍废弃的局面已无力挽回。以四明庙学射圃为例，到嘉定三年，在亭之南北建屋 23 间出租；宝庆二年，“校官方万里恐地久浸失疆界，计其丈石，埋石以识之；绍定四年，教授陈松龙申府复故址，建墙

①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四《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10册，第 7202 页。

② 《宝庆四明志》卷二《学校》，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5015 页。

③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四《绍兴府上虞县重修学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10册，第 7202页。

④陈元晋《渔墅稿》卷五《广州州学序贤堂记》，见《四库全书》第 1176册，第809 页。

⑤ 嘉泰元年仙居县学射圃重加整理，见黄瑞《台州金石录》卷七《宋仙居县重修学记》，收在《石刻史料新编》第 15册，第 11071 页。

宇，规模为之一新。”① 入元以后，均废弃，原有射圃改成了教授厅。这可能是擅长骑马射箭的蒙古人取得政权以后，担心汉人造反，对习射之事讳莫如深，加之蒙古人对儒家繁文缛节的反感，射圃的完全废弛、改作庙学它用也就势所难免。故延祐年间有人就说：“饮射礼废久矣，朝廷之礼又非远民得瞻，其可见者学校释奠耳。”②

明太祖朱元璋上台之后，锐意改革学校，恢复礼治。洪武二年明廷颁布学校格式规定“学内设空阔地一所以为射圃”“教学生习射，但遇朔望的日子要试演过，其有司官办事闲时也与官一体习射，若与有司官、学官不肯用心教学生习射的，定问他要罪过。”③ 这一诏令得到地方的响应，洪武初年许多庙学建起了射圃。以苏州府为例，苏州府学、长洲县学、吴县学、吴江县学、震泽镇学、昆山县学、常熟县学、嘉定县学的射圃均在洪武三年到洪武八年间创建④。射圃的模式基本上仿照宋代。射圃位于学宫周围，前、后、左、右不定。或在学宫前，或在学宫后；或在学宫左，或在学宫右。射圃中建有观德亭，或称射亭、观射亭，一般为三间。“每遇朔望，邑长贰率厥师生习射于其中，射必以耦而进，胜者赏，负者罚，周旋进退于威仪礼让之间，观者莫不赞之。”⑤ 这样的景象只有在皇帝刻意强调，或地方官雅兴

① 《延祐四明志》卷十三《学校》上，见《宋元方志丛刊》，第 6308 页。

② 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十四《释奠位序仪式图》，见《石刻史料新编》第 17 册，第 12603 页。

③ 张林《平山县志料集》，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 24 册，第 142页。

④卢熊《苏州府志》（洪武十二年官刻本,版本下同)卷十二《学校》,第 1—11页。

⑤杨世沅《句容金石记》卷七《射圃记》，见《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 9 册，第 6525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